

“卖瓜难”折射了城乡隔阂

不从根本上改善瓜农的地位,“卖瓜难”依然是每年都会出现的“季节性新闻”。瓜农作难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瓜,而在于农。瓜农在城市里的种种难处,折射的正是不容忽视的城乡差距和城乡隔阂。

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湖南临武的“瓜农之死”尚未平息,哈尔滨又发生了城管打伤瓜农的事件。翻检一下近期的相关新闻,能够更加真切地感触到瓜农进城的难处。即便瓜农死伤在各地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,但是瓜农遇到歧视和刁难似乎是普遍的。罚款、驱逐、没收,个别部门稍微动作一下,瓜农就有千斤压顶的感觉。矛盾一旦产生,卖瓜就成了很危险的事情,瓜农作为孤立的城市外来人员,在冲突中自然占不到什么便宜。

尽管一些城市每年也会指定一些临时摊点,以方便瓜农卖瓜,但是仅靠“法外施恩”的照顾很难从根本

上改善瓜农的地位,“卖瓜难”依然是每年都会出现的“季节性新闻”。瓜农作难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瓜,而在于农。瓜农在城市里的种种难处,折射的正是不容忽视的城乡差距和城乡隔阂。

一些瓜农开着农用车满载了西瓜进城,城市居民大多都见惯不怪,在家门口享受着方便和廉价,而很少去想瓜农的辛苦和无奈。起早摸黑进城卖瓜,冒着各种风险,甚至为了节省成本夜晚都在路边露宿,未必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,而是有很多不得已。因为信息不对称,产销不对接,丰收带来的不全是喜悦,在地头上找不到销路的瓜农除了进城,几乎没有别的出路。大蒜、绿豆等农产品卖不上价,或许还可以等一等,而西瓜不行。就像蒜贱伤农、谷贱伤农,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

地位,只不过在瓜农这里体现得更加明显了。

越是找不到销路,进城的瓜农就越多。进城的瓜农多了,一些城市的管理部門就会觉得麻烦,面对贸然闯入的路边瓜摊,他们不太容易维持城市平时的规矩和整洁了。占道经营、无牌无证、乱停乱靠,等等,一些管理部门眼中的“大忌”,现在也不得不网开一面。一些在农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,在城市也成了愚昧落后的象征。一些城市的管理部門嘴上不说,心里却是抵触的,所以,进城的瓜农不经意间就会惹上麻烦。那些殴打瓜农的管理人员,也不一定就是为了抢几个不要钱的西瓜,大概也是想制造个不欢迎的氛围,让瓜农知难而退。

管理部门驱逐瓜农为的只是城市的“面子”,而瓜农进城卖瓜完全

是为了自家的生计。这就决定了,无论管理部门如何设置障碍,瓜农都要迎难而上。这样的矛盾很容易升级为摩擦,“昨日入城市,归来泪满襟”,每一次摩擦无论结果如何,都会恶化瓜农对城市的印象和评价。

在城镇化的大趋势下,农民进城的潮流不可阻挡,那些身上贴着农字标签的农民工和“农二代”,注定要把自己的未来与城市联系在一起。他们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,不在于穿什么和住什么,而在于他们是否从心里接受了城市。在农民卖瓜都很难的城市,城乡之间的信任和融合注定任重道远。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多一些换位思考,体谅农民的难处,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多考虑一下农民的现实,切实改善他们的地位。

看“冀中星事件”要有公共视角

“冀中星案”

是一个社会标本

娄士强:冀中星是山东菏泽人,人们对山东人的印象就是豪爽和实在,从他在这次爆炸事件中的表现来看,确实是不想伤到无辜的人。他就是个普通的打工者,现如今高位截瘫加上手也断了,他经历了这么多坎坷,确实会有人同情。

金岭: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,不管什么理由都要反对,我相信这个判断能力和是非标准大家还是有的。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,舆论在谴责极端行动的同时,也在不断探寻作案人的动机,并思考其背后的某些社会原因,这并不意味着对极端行动本身的同情。

王昱:情感和法律毕竟不是完全的统一,对冀中星行为性质的认定,还是得按照相关的法律。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实施爆炸,怎么能保证不伤到他人呢?人们对他的同情,实际上是表达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担忧,如果自己遇到了冀中星这样的困境,会不会也因为种种原因,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呢?

急于撇清责任

本身就值得反思

王昱:或许更值得思考的,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同情当事者。一些人赞同他对社会的报复,本身就说明了不公正和无处鸣冤是人们都不能容忍的。这种观念,其实比这些恶性事件本身更值得人们重视。

娄士强: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,主要是一个责任认定的问题,冀中星认为自己是被殴打致残,而东莞方面包括两次审理都对此否认。从报道来看,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待所谓的“黑摩的”时,确实存在暴力执法。东莞事后给了他10万元所谓的人道主义抚慰金,还让他签署什么保证书,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。

金岭:我不相信,一个公民对公正的处理结果会反感到这个程度。事情出来了,有关各方都急于撇清责任、摆脱干系,这本身就是问题。强调群众路线,对一些基层政府和司法部门来说,首先要学会的应该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,多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,这种急于撇清责任的态度,完全是从官本位出发的,即使真的没有责任,或者责任不大,但方法和态度是僵硬的、没有温度的。

自断理性维权路

值得惋惜

王昱:也许冀中星身上的确背负了许多冤屈,但自爆的行为断绝了他的理性维权之路。理性维权路

他能不能走通呢?如果不能,恐怕无法说服更多的人。

金岭:现在的问题是,不管你有多少理由,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,你就得为此负法律责任,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化解,否则,这个社会就没有基本的行为底线,就乱套了。冀中星是个社会的弱者,对他的遭遇,我很同情,更为他自断后路深感惋惜。

娄士强:同样不能忽视的是,哪些力量让冀中星走上这条路。如果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从中学到教训,还是按照老办法去做事,冀中星很可能就只是个开始。毕竟维权的道路既需要维权者理性的选择,也需要职能部门提供这样一条通路,双方沟通才能构成完整的维权链条。如果什么事都等到维权者采取极端方式之后,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,实际上是助长了这种行为。

金岭:对一个公共事件,我们应该用公共的视角来看,这里面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法律标准,毕竟爆炸这种方式,尤其是在机场搞爆炸,这不是正常的表达方式,如果舆论在同情冀中星个人遭遇的时候,对这种方式也持宽容态度,那说明我们公共理性是不健康的。

要充分倾听

弱者的诉求

娄士强:如果不是这起爆炸,冀中星的遭遇很可能永远不会为公众所知。像冀中星这样一个外出打工者,没什么依靠,收入也不高,他的声音很容易被忽视了,在维权过程中,也很难引起职能部门的重视。对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,应该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关怀。

王昱:额外关怀谈不上,只要保证他们得到平等的对待就可以了。冀中星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过激的手段,正是因为他怀疑自己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被保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东莞给冀中星10万块钱,按他们自己的想法,可能还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关怀,但事实上我们看到,比额外关怀更重要的是公正。

金岭:对冀中星这样底层弱者的利益诉求,主流社会只有充分倾听、充分回应,才能给他们一点生活的力量。如果一个社会对弱者的声音忽略不计,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发表过一篇名为《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“沉没的声音”》的文章,文章里有这样的话:在众声喧哗中,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,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。以政府之力,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,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,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,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。我觉得这些话,越读越感觉有分量。